

仙境·夢境·困境

——從〈諫獵疏〉到〈大人賦〉看司馬相如的諫臣焦慮

許東海*

一、緒論：盛世帝國的君王夢景與賦家困境

辭賦的仙道書寫源遠流長，屈〈騷〉與〈大人賦〉皆為其中典範。兩漢以下更成為辭賦代表性之書寫主題。其中重要原因之一，乃是歷代以來仙道信仰除深入民間外，亦經常普遍傳佈於帝王公侯階層。秦漢以來，帝王與方士共築的長生仙夢，與漢代辭賦的經緯交織，尤為漢代仙道文化的重要見証。漢武帝時司馬相如獻奏的〈大人賦〉允為其中經典。其後歷經魏晉南北朝到李唐帝國，王室更推尊老子李聃，蔚為國教。隋唐以後帝王之家亦不乏崇道慕仙之舉，宋代徽宗之迷狂沉溺，歷歷史籍，浸至明代，仙道依舊深入民間社會，並成為明太祖朱元璋以下帝王之崇信風尚。¹

漢賦與唐詩是見證中國歷史上漢唐帝國盛世前後輝映的二大文學座標，其中帝國君主與神仙文化二者間的互涉交集，儼然成為炎漢與李唐帝國歷史在文武功業之外，另一饒富特色的帝王文化風情，於此之下，圍繞其身邊的文學侍從不免一面洞鑿帝王神仙慕企的內在心靈世界，另一方面也往往借題發揮，寓託其諷諭意圖，尤其是攸關君國治道或天下政教的旨諦。因此漢武帝文治武功鼎盛之際，卻對嚮慕仙道始終如一，甚至如痴如醉，積重難返，其崇信方士李少君神仙之說之事蹟，即可略窺其豹；²而司馬相如作為帝王身邊的漢代賦家，在本質上不免為班固〈兩都賦序〉所謂「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下的文學侍從本質，而他針對漢武帝沉溺神仙之道所獻奏的〈大人賦〉及其諷諭意涵，顯然涉及仙境文化與帝國或帝王的彼此深契，及其在創作者與閱讀者之間的關係建構，其間顯然不無涉及衝

* 許東海現職為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¹ 參見拙文：〈仙道、聖政、世變——宋濂〈蟠桃核賦〉之仙道書寫及其明初史學意涵〉，《漢學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頁108。

² 參見〔漢〕司馬遷：《史記·封禪書》（臺北：大申書局，1977年）卷28，頁1384-1386。

突或抗拒，甚至關涉所謂說服的策略及其議題，而其結果往往映現出以辭賦或文學之姿，行諫書或奏疏之實的說服困境，或者是回過頭來重新審視書寫者自我身分定位，及其與諷諭效果得失成敗間的困境主題。凡此種種皆為司馬相如〈大人賦〉仙境書寫背後，所實際涉及的多面向觀照，其中至少映現盛世帝國的帝王與仙道、君王與賦家、辭賦與諫書等等圍繞「仙境／夢境／困境」主題的相關意涵。

炎漢帝國之下的武帝與司馬相如，藉由〈大人賦〉所映現的，正是一場攸關帝國仙道文化所展演文學創作，並以「仙境／夢境／困境」為其論述的重要內在底蘊，而在炎漢之後，再次締建歷史上帝國盛世之姿的李唐王朝，其中唐太宗的貞觀之治與唐玄宗開天盛世允為典範，然則儘管從帝王個人心靈世界而言，並非漢武帝式的沉溺仙道，至於難以自拔，然而從唐代帝國而言，李唐王室即大肆標榜系出老子李耳之後，道教儼然被王室正名為當代國教，如此一來，仙道文化自然水到渠成，化身為唐代帝國上自帝王，下迄民間最重要的宗教文化代表，風行草偃，蔚為風尚，因此自李唐開國迄至唐玄宗在位的唐前期，基本上道教的政治地位呈現蒸蒸日上的趨勢，³就其發展或演變關鍵，誠然不在帝王本身對於宗教的表層的愛憎與尊抑，而更主要源自於宗教與政教二者互涉的治道意涵；換言之，其背後顯然深刻體現攸關「仙道與治道」的論述主題，並且就此一問題而論，對漢武帝與唐玄宗兩位盛世帝王而言，大體可謂同質異構。

因此藉由漢代賦聖與唐代詩仙同為仙境書寫的代表作品，及其以賦學為中心的歷史文化連結，審視其中攸關漢唐帝國及其帝王的仙道文化所映現的「仙道與治道」論述，並詮釋其中共同涉及文化世變、身分定位及其情志困境，從而觀照源自漢賦與唐詩代表作家的仙道書寫及其典範承傳，所映現的帝國「仙道／治道」底蘊，並且從而得以窺探其背後所攸關的賦學意涵。至於本論文主題所揭司馬相如〈大人賦〉的歷來研究，雖已累積相關豐富成果，但基本上較少結合漢賦神仙書寫與帝國仙道風氣二者作專門而深入的探索，筆者因於2000年陸續發表有關這一方面的論文兩篇：〈賦家與仙境：論漢賦與神仙結合的主要類型及其意涵〉、〈漢賦與古典說服：從《鬼谷子》看司馬相如、揚雄賦中的神仙論述〉，⁴至於原始研究構思則嘗

³ 參見趙克堯：〈唐前期的佛道勢力與政治鬥爭〉，收於氏著：《漢唐史論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82-97。文中指出唐初開國君主尊道崇祖，並非純出於宗教尊仰之爭，更多涉及政治之爭等等實際問題，高宗基本上崇道更力，東封泰山後，更拜謁老君廟，「上尊號曰太上玄元皇帝」，武則天即位尊佛抑道，亦為區隔武周與李唐之政治策略，故至玄宗，重振唐初祖宗，崇道抑佛，仍然深具政治意涵，更以御注《道德經》作為盛唐帝國治道之重要思想依據。

⁴ 參見拙著：《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臺北：里仁書局，2003

試藉由司馬相如〈大人賦〉的經典傳承，及對於詩仙李白的典範召喚，及其仙道譜系轉換，審視漢、唐歷史盛世之間帝國與帝王仙道文化的「治道」意蘊及其文體與文化的世變脈動。至於本文主要具體藉由兩部分展開探索：(1) 司馬相如〈大人賦〉與其諷諭對象漢武帝二者之間，所映現的「仙道／治道」諷諭及君臣焦慮；(2) 司馬相如並非徒以作為帝王身邊的言語侍從，以獻賦邀寵自足，而是藉由獻賦邀寵的踏腳石，進而便於以獻賦與諫書二者交叉為用，展現文學語言侍從頌美意涵之外，寓託諷諫帝王治道的終極關懷。例如〈諫獵疏〉即直接以諫書形式，向漢武帝提出建言，《史記·司馬相如傳》載敘其事謂：

嘗從上至長楊獵，時天子方好自擊雄彘，馳逐野獸，相如上書諫之。⁵

因此藉由在司馬相如文集裡絕無僅有的此篇諫書的重新審視與探索，應該得以略窺賦聖躬逢漢代帝國盛世之際，向漢武帝獻賦及上書背後的重要心靈脈動及其諫臣焦慮。

二、侍從與諫臣：司馬相如的獻賦上書及其諷諭意圖

司馬相如早期客遊梁孝王之處的數年內，即應已撰寫〈子虛賦〉，其後轉至朝廷成為深具言語侍從之臣身分的專業賦家，此時漢武帝既網羅不少能文之士，自身又好賦且作賦，遂在「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的鼎盛風氣之下，⁶藉由〈子虛〉、〈上林〉迄至〈大人賦〉的前後獻賦之舉，展現其以晉身帝王旁邊的言語侍從，甚至躋登建節往使西南夷的中郎將之位，⁷根據

年)，頁 147、201。又其中〈賦家與仙境——論漢賦與神仙結合的主要類型及其意涵〉，原發表於《漢學研究》第 18 卷第 2 期（2000 年 12 月）；〈漢賦與中國古典說服——從《鬼谷子》看司馬相如、揚雄賦中的神仙論述〉發表於《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8 期（2001 年 3 月）。

⁵ 參見《史記·司馬相如傳》，其文要旨有三：（一）「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軼下，而羌夷接軼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二）「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三）「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上引司馬相如〈諫獵疏〉原文參見司馬相如撰，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頁 66。

⁶ 參見簡宗梧：〈從專業賦家的興展看漢賦的特性與演化〉，收於氏著：《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1993 年），頁 201-213。

⁷ 參見《史記·司馬相如傳》：「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

《史記》載錄，司馬相如順利獻奏〈子虛〉、〈上林〉等賦篇後，「天子以為郎」，接著即有〈喻巴蜀檄〉等參與邊政議事，乃有「拜相如為中郎將」，以及「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由此觀之，儘管司馬相如也有「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的一面，但其中原因多端，並不足以抹煞或忽視司馬相如意圖藉由奏疏上書諷諫的歷史事實及其諫臣意識。

被後世推崇為賦聖的司馬相如，因所撰著名篇章如〈子虛〉、〈上林〉及〈大人〉等賦，基本上皆採用曲終奏雅的諷諫手法，往往被視為一種無關君王治道或帝國政教痛癢的點綴與裝飾，甚至連他的最重要的追隨者，且以摹仿到創新，終至在文學史上與司馬相如齊名的揚雄，都不免產生對當代賦家「欲諷反勸」的自我解嘲，以至於後代評論司馬相如賦的創作，也不乏指陳其「諂諛之意」，⁸其中蘇東坡對〈大人賦〉的評述可為代表：

司馬相如諂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可已者耶！列仙之隱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鵬賦〉，真知大人者也。⁹

所謂「諂諛之意」或「逢君之惡」的批評，從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迄至晚期之作〈大人賦〉、〈封禪書〉的侈麗閎衍，並且針對漢武帝性情而從其所好，固然可以順理成章而作如是觀，例如黃震所謂：

相如之賦果何為者耶？景帝之不好此人，情之正也，而武帝溺焉。嗚呼！於身則求藥長生，於兵則窮威萬里，於宮室則千門萬戶，而於文則好相如之賦，飄飄有凌雲之氣，皆類也，於是武帝之志荒矣。¹⁰

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⁸ 參見〔宋〕蘇軾撰，張志烈等校注：〈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可已〉，《蘇軾全集校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65，頁7222。文謂：「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矣。諂媚之意，死而不可已，猶作〈封禪書〉；又如〔宋〕黃震：《黃氏日抄》（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卷47，頁584，意謂：「相俗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是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⁹ 〔宋〕蘇軾撰，張志烈等校注：〈臞仙帖〉，《蘇軾全集校注》卷65，頁7224。

¹⁰ 〔宋〕黃震：《黃氏日抄》卷46，頁579。

無論司馬相如曲終奏雅的漢賦諷諫實際效果是否足以發揮，然而回歸當代詩教的經學向度觀之，對於作為重視古詩流亞及其諷諫精神的漢代賦家而言，顯然其中也蘊藏一種根植於《詩》教溫柔敦厚文化之上的當代新變，其中的鋪張揚厲與驚采絕艷既得之於楚〈騷〉的沾溉，而「控引天地，錯綜古今」，更借鑑於戰國策士的縱橫風氣，然則楚〈騷〉的周遊神界主要展現屈原的士臣忠怨隱喻，司馬相如〈大人賦〉仙境幻遊則體現為盛世帝王的巡遊氣象，其中漢賦變創的主要關鍵，在於取精用宏地擷取先秦楚〈騷〉與縱橫之風，却又回歸《詩》教側隱古詩之義的諷諫精神，值得注意的乃是此種諷諫型態在漢代也被認為足以闡揚孔子的君臣諍諍理想，並且深獲儒家正名與背書，故劉向《說苑》謂：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之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¹¹

雖據現所殘存之《大戴禮記》未能見及相關記載，但根據唐代李賢注《後漢書·李雲傳論》時曾引《大戴禮記》謂：「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陷諫。」¹²可知雖名目與分類互有出入，但諷諫則為其中唯一不易者，由此觀之，司馬相如賦的「欲諷反勸」或「曲終奏雅」種種看似漢賦創作的遺憾或缺失的批評，實際上適足以映現其最重要的諷諫本質，至於像鋪采摛文或侈麗閎衍的書寫縱容，或許不妨視為其諷諫精神及其說服策略下的賦家創作權變，儘管在實際的勸諫效能發揮上，不免往往事與願違，然而就其賦家之外的諫臣想望而言，不應完全忽略其實際上的斬獲與推進，其一乃在司馬相如諷諫手法，按照劉向《說苑》的詮解，完全符合儒門孔子的君臣之道與仁者之禮，既無危君之過，亦避危身之禍；其次正因為在採取諷諫策略，就必須掌握且迎合帝王心理，方得以藉此暗

¹¹〔漢〕劉向撰，趙善詒疏證：《說苑疏證·正諫》（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0年）卷9，頁239。

¹²〔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李雲傳論》（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57，頁1853-1854。謂「禮有五諫，諷為上。」，李賢注引《大戴禮記》之說。

渡陳倉方式，提示或警惕君王攸關君國治道的憂患，就其策略而言，看似無關痛癢的「曲終奏雅」，其實何嘗不是有其必要的手段，甚至鋪陳，也是一位不願自甘為文學侍從，或見視為倡優的賦家責無旁貸之努力，或許還是一種賦家用心良苦的另類必要之惡，那些「曲終奏雅」的諷諫旨趣也許看似披著儒家外衣的糖衣錠，¹³實際上應該也是為著篤守儒家《詩》教諷諫精神的必要過程；再者，若無如是藉由迎合或掌握帝王一類接受者的鋪采摛文，固然無法繼續立足文學侍從之列，朝夕獻納，以把握各種伺機諷諫的機會，尤其是讓帝王對之卸下一般諫臣的防備心理，又如何會出現司馬相如日後奉命建節往使以交通西南夷的貢獻，¹⁴而司馬相如的諫臣想望始終並未忘懷：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¹⁵

由此觀之，出之以賦頌之體的〈難蜀父老〉，其實最初的創作本衷就是進諫，而後審時度勢，改以賦體問難形式，從而在其虛構問對之中，流露其中諷諫旨趣，並昭告百姓，因此〈難蜀父老〉之作，本質上乃是一篇源自諫書的賦體變創，而司馬相如則是運用辭賦之體加以借屍還魂，換言之〈難蜀父老〉正是一篇以辭賦為名，以諫書為實的，並且最終出之古詩之流亞的諷諫姿態。由此觀之，《史記·司馬相如傳》有關〈難蜀父老〉的創作轉折，適足以見證司馬相如於辭賦創作背後，經常潛藏另一種諫臣意識的身分認同或角色期待。

從司馬相如現存的文集看來，除了像〈難蜀父老〉初始即深具諫書意涵的賦體作品外，還存留一篇直接出之以諫書形式的〈諫獵疏〉，此一奏疏

¹³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年），頁92-93。

¹⁴ 參見《史記·司馬相如傳》：（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卷57，頁3046-3047。謂：「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駝、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

¹⁵ 《史記·司馬相如傳》卷57，頁3048。

誠為司馬相如在賦家身分之外，改以直接諫臣姿態進行君臣對話的具體見證，其中最重要的意涵乃是證成司馬相如念茲在茲，而且始終未曾放棄的盛世諫臣夢想，也應該是前此因「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為郎。」¹⁶後的進諫實踐，至於司馬相如初始「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¹⁷其中原因除了身體疾病及家境富裕因素外，應與他前此遭讒失官的心理挫折有關，¹⁸然而即使如此，當他隨從漢武帝至長楊宮遊獵時，竟當機立斷並在有限時間內，寫成這篇不到 300 字的諫書，以當時司馬相如往往「稱病閒居」的仕宦心態，若非長久以來念茲在茲的諫臣意識，及其長久以來心懷君國盛衰興亡的情懷，應該難以勇於向武帝上奏諫書，由此觀之，司馬相如的諫臣意識不僅躍然紙上，而且難以掩映。

三、漢賦與諫書——〈諫獵疏〉與〈哀秦二世賦〉諷諫時機與手法的對讀

〈諫獵疏〉為司馬相如難得一見傳世的正式諫書，却具體而微地映現他長久潛藏於內心的諫臣意識，從〈諫獵疏〉的主要內容加以審視，主要乃針對漢武帝「好陵阻險，射猛獸」，將遭致萬乘之主可能之不測與危殆一事而發：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¹⁹

其中漢武帝本身的性命安危問題，顯然成為司馬相如呈奏〈諫獵疏〉的主要焦點，因此作為天子身旁侍從，見「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而當機立斷上奏諫書，固然水到渠成，順理成章，且深獲武帝嘉許，然而若自〈諫獵疏〉曲終奏雅地歸旨於「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其實讀者不難洞鑒作者別具用心，延展為另一層深富諷諫意味的言外旨趣：

¹⁶ 《史記·司馬相如傳》卷 57，頁 3053。

¹⁷ 同上註。

¹⁸ 參見萬光治：《蜀中漢賦三大家》（成都：巴蜀書社，2004 年），頁 26。

¹⁹ 參見〔漢〕司馬相如，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成都：巴蜀書社，2000 年），〈諫獵疏〉，頁 66。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得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²⁰

所謂「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者正是言外意、弦外音，然則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者，就〈諫獵疏〉而言，小者主要乃指涉帝王「好陵阻險，射猛獸」一事，至於冀盼武帝留意幸察的大者，從漢武帝平生既沈酣田獵，縱逸豪華，尚武好功，又頻頻發動征戰，威厭四方，如是種種攸關帝國盛衰與君王治道的危機，恐怕才是司馬相如〈諫獵疏〉以小喻大的諷諫旨諦所在，例如西漢賦家孔臧〈諫格虎賦〉借大夫之口，所揭示的君國治道論述，足資參證：

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²¹

司馬相如〈諫獵疏〉針對漢武帝遊獵將陷天子安危禍福於不測的表面進諫之旨，質實而言，並非〈諫獵疏〉最重要的終極關懷，攸關君國治道的禍福得失，宜其方為此篇深層的微言大義。並且前此的〈上林賦〉已然藉由抨擊諸侯逾越禮制的田獵排場，諷諫君王縱逸於苑囿馳射之樂的治道憂患，例如：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駒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揜群雅；悲伐檀，樂『樂筮』。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轟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²²

由此觀之，司馬相如此篇諫書，其實又在帝王安危表層旨趣之外，儼然同時又融入作者慣於運用諷諫的賦家手法，而其中最重要的意涵，除了深刻

²⁰ 〔漢〕司馬相如，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諫獵疏〉，頁 66。

²¹ 〔漢〕孔臧：〈諫格虎賦〉，費振剛，仇仲謙，劉南平校注：《全漢賦校注》（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153。

²² 〔漢〕司馬相如，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上林賦〉，頁 23。

映現司馬相如篤守古詩流亞的賦家本色外，〈諫獵疏〉的欲言又止及其明而未融，其實也見證像司馬相如這般不願自囿於帝王文學侍從身分的漢代賦家，游移於進退之間的諫臣焦慮，其中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例如司馬相如建往使節西南夷立下功業，竟終至遭讒失官，加上雖晉身郎官，畢竟人微言輕，加上西南夷之事，與朝廷公卿看法違忤，若勉強勇於自任，力奏諫書，恐禍福旦夕更加難測，因此，若由這些事端觀之，難免會令他躊躇不前，於是面對漢武帝仍然無法暢所欲言，直諫無隱，其中除了深涉司馬相如本身性情與賦家本色外，其實應可視為漢代賦家面對身分認同及情境認知之下極為重要的精神困境，亦即在原有賦家本位上，渴望實現職能的精神焦慮，於是在角色期待之下，呈現出掙扎於賦家與諫臣的心境，故具體而微地導致司馬相如上述的創作取向，其中，饒有興味並值得參證的是〈哀二世賦〉的書寫手法，適與〈諫獵疏〉相反相成。

〈哀秦二世賦〉緣由於司馬相如「從上至長楊」，就在歸程中途，路過宜春宮，而此地乃是秦二世的陵墓所在，因此「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哀秦二世賦〉乃弔古之賦，文字簡短，與〈諫獵疏〉應皆為即興之所賦，而賦篇前半鋪衍二世陵墓的地形與風景，固然深具賦筆風華，惟賦篇後半，雖不失辭賦體式，然而字裡行間，儼然重現屈〈騷〉深富忠諫情思的書寫身影：

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寔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矣。嗚呼哀哉！²³

如是鋪陳秦二世的君國與治道論述，不僅重現諫書中慣常運用的歷史戒鑒程式，而且顯然意圖藉由秦二世的殷鑒不遠，轉化為諷諫漢武帝的言外之意；換言之，乃以哀弔之名，行其諷諫之實，更何況〈哀秦二世賦〉所指陳的「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若無論從上述司馬相如前此不久所進〈諫獵疏〉中所揭攸關帝王安危及其君國隱憂，所謂「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的諫諍旨趣，二者之間顯然形神相契，甚至於〈哀秦二世賦〉的這段簡要主旨，措辭嚴肅扼要，深中肯綮，更能體現諫臣口吻。由此觀之，〈諫獵疏〉與〈哀秦二世賦〉不論從創作時機及其形式與內容而言，都充分展現司馬相如當時掩抑不住且游移於賦家與諫臣身分之間的內在精神焦慮，也因此〈諫獵疏〉與〈哀秦二世賦〉二者之間，雖然分別為奏疏與辭賦不同文章體類，然而彼

²³ 〔漢〕司馬相如，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哀秦二世賦〉，頁 69。

此屬性區隔並非截然分明，其中〈諫獵疏〉「其言雖小，可以喻大」的暗示或提示漢武帝的手法，儼然辭賦創作神理；反之，〈哀秦二世賦〉直陳君國興亡禍福之數，又宛若諫臣口吻，從司馬相如在漢武帝面前，所具備的賦家主要身分而言，其實適得以歷歷如繪地映現司馬相如潛藏內心深處，而又隨時可能被召喚浮現的諫臣意識，並且在其實際的辭賦創作，甚至諫諍實踐中，若隱若現，明而未融，從而呈現漢代賦家身分之下，往往潛伏的另一種諫臣焦慮。

由上觀之，就司馬相如本身而言，無論是文學侍從或是晉身郎將，顯然始終未嘗儘以獻賦邀寵之目的自限；反言之，即使著書獻賦，基本上皆欲以諷諫天子為目的，具有濃厚的君國意識與治道關懷，例如〈難蜀父老〉之撰，即緣由於：

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²⁴

至於司馬相如直接以獻賦諷諫武帝的史實亦不乏其例，例如〈哀二世賦〉本在獻奏〈諫獵疏〉之後，由於獲得君王善意的回應與嘉許後，儼然在打鐵趁熱之際，改以哀秦二世的辭賦書寫，以悼古文學之形式，行其諷諫武帝之實，意圖運用獻賦與諫書交相為用的諷諫策略，達成其以古鑒今的治道諷諫意圖：

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魂無歸而不食。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曩邈絕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²⁵

秦二世之墳塚葬於宜春宮附近，而司馬相如前此既以〈諫獵疏〉直接諫諍君王，乃順水推舟地掌握秦二世「持身不謹」、「信讒不寤」的歷史借鏡，寓託君王立身與攸關治道的諷諫旨諦。如是的賦家夢想，對於司馬相如而言，大體可謂終其一生，念茲在茲，因此我們不難發現他即使於辭世之前所撰寫賦體〈封禪文〉，從表面觀之似乎主要在勸請漢武帝進行泰山封禪大典，體現賦家揄揚盛德的創作職能，然而字裡行間卻也往望寓託攸關君國治道的諷諭旨趣，如明君賢臣之遇合；仁者無敵的德政；居安思危的長治等等，從而體現其賦家身份之外的諫臣姿態，因此據史傳所載，司馬相如

²⁴ 同上註。

²⁵ 〔漢〕司馬相如，李孝中校注：《司馬相如集校注》，〈哀二世賦〉，頁 69。

臨終前仍念茲在茲撰成《封禪書》，向漢武帝建言宜行封禪泰山之大典，²⁶仍然可以體現司馬相如一生絕非以獻賦邀寵的宮廷文學侍從自限。

四、仙境與困境：〈大人賦〉的仙道演繹及其治道隱喻

由上述亦可見司馬相如的獻賦諷諫往往伺機行事，深諳帝王心理，頗深契於說服學的基本原理與要領。²⁷從因勢利導迄至化被動為主動等等說服學的原則而言，對照《史記·司馬相如傳》所載有關〈大人賦〉的獻奏背景與時機而言，皆深切契合中國古典說服學著作經典《鬼谷子》的重要原理及要領，例如「分威」²⁸與「散勢」²⁹兩大要術，亦即要求營造或創造說服者培養威勢並懾服接受者的有利形勢，尤其強調說服者必反客為主，逆轉彼強我弱與人尊我卑的原有態勢。依據此一說服旨趣，審視史傳所載司馬相如〈大人賦〉乘勝追擊的撰寫緣起，可謂若合符節：

相如拜為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³⁰

然則〈大人賦〉從書寫策略而言，固然順應了武帝對於神仙世界之戀慕沉醉，然從其賦篇旨奧乃在「相如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³¹雖然別具仙道與治道諷諫意涵，而所謂「此非帝王之仙意」實際上適與前此司馬相如所上〈諫獵疏〉所謂「本非天子之所近也」的諷諫口吻，如出一轍，只是出之以辭賦，畢竟不等同於一篇諫書，因此相形之下，旨趣顯得含蓄隱約許多；另一方面也由於其以諷諫為主的策略，乃是結合始以迎合帝王仙道認同及其企慕想望心理，不免展現為「曲終奏雅」及「正言若反」的創作程式，也才會導致「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

²⁶ 據《史記·司馬相如傳》載：「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²⁷ 參見拙文：〈漢賦與中國古典說服〉，收於氏著：《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頁 201。

²⁸ 據《鬼谷子·本經陰符七術》（臺北：金楓出版社，1991 年），頁 141。載其文謂：「分威者；神之覆也，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其形，無能間者。審於唱和，以間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也。」

²⁹ 同上註，頁 144，所謂「散勢」者，乃是「乃是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

³⁰ 〔漢〕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臺北：鼎文書局，1997 年）卷 57，頁 2592。

³¹ 同上註。

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似游天地間意。」³²儘管〈大人賦〉的最終說服效果不如預期，甚至逆轉為「欲諷反勸」的意外結果，却也深切反映出司馬相如〈大人賦〉意圖藉由獻賦君王，達成以仙道鋪陳，通往治道諷諭的創作動機，其後漢賦大家揚雄提出辭賦乃「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的說法，其實適正反映司馬相如〈大人賦〉中「仙道與治道」論述，游移於帝王情境與賦家情境間的掙扎或拔河，甚至更是其辭賦書寫與諷諭困境的另類詮釋註腳：

雄以為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³³

從揚雄對於漢代賦家往往陷入欲諷反勸的諷諭結果，固然是一種理性而冷靜的當代洞鑒，却也同時映現其中不得不然的賦家困境。

揚雄論賦所揭示的此一漢賦言說策略及其諷諭效能之省思，從上引史傳載敘內容來看，正是主要依據司馬相如對漢武帝獻〈大人賦〉的實際效果而論，所謂「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似游天地間意。」固然與司馬相如意圖導向「非帝王之仙意」的初始旨趣背道而馳，然而從其說服策略的心理運用而言，仙道世界既為漢武帝戀戀情深的另一精神國度，於是因勢利導，並揣摩其情，以便藉由辭賦諷諭，提示君王仙道世界並非如武帝所想像的盡善盡美，甚且還有其清簡平淡的一面，與帝王宮廷的奢侈奢華根本不可同日而語，所謂「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適足說明司馬相如並非以一般諫臣之姿直指其中攸關治道的是非得失，而是巧妙將自己扮妝或虛擬為亦臣亦友的作者身分，用一種較為親切而溫情的言說姿態與口吻，進行柔性勸說，其中仙境鋪陳的縹緲奇幻，只是作者明修棧道式的華麗煙霧彈，而其實進行「暗渡陳倉」的掩護策略及其諷諭意圖，其間司馬相如亟欲偷渡者，則是攸關帝王謹身持操與得失興亡的治道底蘊。

漢代賦家如是進行帝王諷諫的策略與手法，所謂「曲終奏雅」的創作程式，之所以選擇非以諫臣之姿，甚或優先考慮直諫形式，基本上既關涉漢代賦家的自我身分認知問題，所謂文學侍從的當代君臣情境結構；另一方面也是一種自我保護下，置身於進退迴旋，難以左右逢源的賦家焦慮，及其無從選擇的唯一出路。並且此一賦家心理顯然也可徵諸司馬相如的〈諫

³² 〔漢〕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頁 2592。

³³ 〔漢〕班固《漢書·揚雄傳》（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卷 87，頁 3550。

獵疏〉。此篇諫書雖以奏疏形式揭明「自擊熊羆，馳逐野獸」之過，進而指涉漢武帝躬自馳獵背後的好大喜功與立身失謹，但在針砭君王之失，冀其回歸帝範常軌的說服策略上，仍然傾向以迂迴前進與旁敲側擊的諷諫方式，其中主要訴求與觀照，乃在賦家對武帝聖躬安危的關懷與憂心，而非直接彰顯其好大喜功或立身不謹等等攸關帝王治道得失之諫言。由此觀之，司馬相如即使在辭賦獻納此一主要途徑之外，偶亦不乏直接呈奏書的諫諍舉動，然而從上述〈諫獵疏〉的諷諫策略及其操作取向觀之，仍然明顯呈現與其辭賦近似的「微言相感」諷諫本質；另一方面，也正映現「賦者，古詩之流也」的「聞之者足戒」、「言之者無罪」的《詩》教諷諫旨諦，以及賦家習於此道，並洞鑒其中安危利害的困境與焦慮本質。

由於賦家深好且擅長上述的諷諫形式，然而就其實際說服效果而言，往往仍然無法達到預期理想，其中因素固然紛沓多端，但就君臣情境下的賦家職位與身分而言，應為重要關鍵之一，由是觀照司馬相如〈大人賦〉的仙境論述，從古今說服學的理論觀之，其中固然也是作者運用不少原則與綱領，例如《鬼谷子》所謂〈內韃〉、〈中經〉、〈摩篇〉等「情合者聽」與「其道父隱微」等等有利的說服情境。³⁴

至於〈大人賦〉的順利獻納，並獲得漢武帝「天子大說」的正面回應，一方面固然映現武帝好大喜功的帝王性情；同時也正是得力於賦家揣摩武帝戀慕仙道的心理世界。³⁵因此，司馬相如以仙境為釣餌，在鋪採摛文作意好奇之下，所謂「賦取乎麗，而麗非奇不顯，是故賦不厭奇」，³⁶如此君臣同氣相應之下，司馬相如水道渠成地展開〈大人賦〉的仙境演繹及其相關論述，然而就其賦家背後用心所在，其實並非著眼於帝王對於仙道的好惡同異本身，而是指涉君王過度沉酣仙道，將牽動君國治道軌範的偏離與崩壞。

從史書所載有關漢武帝一生沉迷仙道的時間及程度，司馬相如的諷諫與用心顯然並非無的放矢的文學侍從創作或賦家遊戲，而是深具嚴肅的君國治道意涵，此一歷史事實，從武帝執迷不悟方士李少君之說，例如「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等例，³⁷甚至於在李少君病死之後，漢武帝以其「化去不死」，接著更引來「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更來言神事」³⁸凡此不一而足的史書載錄，不難略窺武帝沉迷仙道，將有違帝王之道的憂患與危機，更

³⁴ 參見拙文：〈漢賦與中國古典說服〉，頁 220-225。

³⁵ 參見《鬼谷子·摩篇》之謂：「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摩之以其所欲，測而深之，內符必應。……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

³⁶ 賦尚奇求麗，參見劉熙載：《藝概·賦概》（臺北：廣文書局，1973年）。

³⁷ 分別參見《史記·封禪書》，卷 28，頁 1386；《漢書·郊祀志》卷 25，頁 1219。

³⁸ 《史記·封禪書》卷 28，頁 1387。

何況如建築甘泉宮之仙境模擬，仍一一映現武帝之戀慕仙道，並非甘於道家清靜無為的出世思想或黃老治術；反之，還成為其帝王好大喜功心理作崇下的踵事增華與變本加厲：

於是上令長安則作飛廉、桂館，甘泉則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³⁹

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於是作建章宮，……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⁴⁰

由此觀之，像漢武帝建造甘泉宮與建章宮這類仙境虛擬的宮殿建築，固然出自帝王對於仙道的迷戀與沉溺，但自君國治道而言，適亦却也映現其好大喜功心理下的奢華無度與本末倒置，⁴¹如是的偏離治道常軌，衍變為帝王仙道迷航遂成為司馬相如〈大人賦〉憂時淑世與諷諭帝王的重要文學隱喻；同時藉由仙境世界的巨麗闳衍與曲終奏雅，固然賦家慣用的此類正言若反及其譎諫策略，因其「勸百而諷一」的書寫程式，容易變為揚雄所謂「欲諷反勸」的期望落空；換言之，從〈大人賦〉仙境神遊的主要鋪陳，迄至「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⁴²的諷諭旨趣，其中賦家仙道書寫的背後，誠然深具濃厚的治道意涵及其諷諭困境。

五、夢境與困境：〈大人賦〉的帝王夢幻及其賦家憂患

司馬相如〈大人賦〉裡大肆鋪陳的仙境繽紛，從表象而言，顯然亦扮演了帝王神仙大夢的最佳代言人，同時對於賦家本身而言，從以賦說夢，到如賦如夢的語言魔術演繹，就閱讀者或接受者而言，彷彿正是一場針對漢武帝這位仙道追夢人量身打造的國王夢幻衣裳，一切如夢如幻，似有若無，難怪其後以模仿司馬相如起家而成名的漢賦大家揚雄在論述甘泉宮虛

³⁹ 《漢書·郊祀志》卷 25，頁 1245。

⁴⁰ 同上註。

⁴¹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參見〔宋〕司馬光：《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 22，頁 405。

⁴² 參見《漢書·司馬相如傳·贊》卷 57，頁 2609。

擬仙境特質時，油然觸發雖「方征僑與偃佺兮，猶仿佛其若夢。」⁴³其實正一針見血地揭發漢代帝王仙道迷思與賦家之間，水到渠成地以夢幻為其對話核心及論述交集的重要特質。

司馬相如主動獻奏〈大人賦〉固然使得漢武帝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也因此導致揚雄發出「勸百而諷一」或「欲諷反勸」的辭賦諷諭評論，然則作為漢賦最重要代表賦家的司馬相如與揚雄，二者如是不同的觀照取向，實際上適亦映現漢賦作者處原有文學侍從身分，却又意圖跨界成諫臣之實的傳統士臣職志密切相關，因此從書寫策略或說服程式上，必要顧慮接受者帝王心理的喜好與忌諱；另一方面賦家本身基本上不願妄自菲薄地以俳優、倡者自視，反而亟思創意，以達致諷諭君王的另類諫書型態，從而展現其漢賦貴遊諷諭的重要意圖。

由上觀照〈大人賦〉的創作現象及其省思背後，即得以洞燭本質上攸關帝王與賦家之間，游移並掙扎於武帝仙道夢幻書寫，與司馬相如憂患武帝因迷航仙道而背違治道的書寫焦慮，其中帝王仙國夢境是不得不然的必要鋪陳，而治道諷諭亦復是漢代賦家自期自許，甚至當仁不讓的創作職志，因此就上述〈大人賦〉創作前後的歷史事實載敘而言，應足以彰顯像〈大人賦〉如是創作背後，攸關帝王夢境與賦家困境之間重要的主題意涵。

就漢賦文體而言，無論如何寓託或歸旨於諷諭大義，本質上畢竟並不同於一般諫書性質的奏議論疏文，因此大肆於內容之誇張與語言之加工，所謂「鋪采摛文」的「體物」書寫，自然成為漢賦貴遊諷諭創作上，因循相承的必要書寫原則，⁴⁴於是〈大人賦〉不僅迎合著接受者漢武帝的神仙夢想，從而進入仙國夢土的仙境書寫，其中不僅在賦家彩筆渲染之下如夢似幻，恍如所謂「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紅杏渺以眩潛兮，森風涌而雲浮。……莅颯卉翕標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如是的縹緲虛無，變化莫測，儼然營構出仙境書寫的夢境虛擬取向，從而令讀者在「如詩如夢」的譬喻之外，進而觸發「如賦如夢」一類的獨特審美想像。其中夢幻意境取向對於

⁴³ 〔漢〕揚雄：〈甘泉賦〉，收於〔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卷7，頁328。

⁴⁴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年），頁90。其文謂：「這些作品，當初帝王何以對其詭濫夸飾沒有任何的疑惑或批評？其實，那時帝王並不要求辭賦反映真實，而是要藉它滿足驕奢之情。貴遊性質的辭賦之作，不論是場面的描述，或盛德的形容，不誇大增美，如何能快主上之意？如何能愜君王之心；所以辭賦肆其內容的誇張，是作者討好欣賞者所不得不講求的特色，也就難怪『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困』了。」

〈大人賦〉而言，既是作者鋪陳仙境的賦筆特色，同時也是司馬相如在貴遊諷諭的歷史情境或君臣生態下，刻意迎合的帝王夢想國度。

神仙想望及其長生想像自古以來經常成為帝王的共同春秋大夢，而秦始皇與漢武帝更是其中的代表典範。就漢武帝而言，文治武功一時鼎盛，帝國天下可謂炳耀四海，其帝王人生最大的遺憾，無論帝國功業如何震古鑠今，却依舊是有時而盡，面對著逝者如斯，不舍晝夜的歷史長河，依然始終無法長生不死甚至進而千秋萬古坐擁帝國基業與權力地位，於是仙道追求遂水到渠成化身為此一帝王生命困境及其焦慮主要隱喻，因而自此一面向加以觀照，無論漢代方士像李少君這些人物的出現，迄至漢代第一賦家司馬相如〈大人賦〉中令武帝「飄飄有凌雲之氣」的仙境鋪陳，甚至因此導致揚雄高揭其中難以擺脫「欲諷反勸」的賦家悔悟及其諷諭困境，其實適一一見證〈大人賦〉書寫背後，帝王與賦家之間，彼此攸關仙境、夢境與困境的文化身影及其深層底蘊。

六、結論：從〈諫獵疏〉到〈大人賦〉：漢代賦聖追夢諫臣的焦慮隱喻

從中國歷史盛世而言，漢武帝無疑是炎漢帝國最主要的天子治道典範，然則若由其仙道迷狂的側面觀之，同樣地終兩漢之世，可謂無出其右，望塵莫及，至於他終其一生的帝王仙夢，竟遲至晚年方始在登仙未果的失落中翻然悔悟，從而洞鑒仙道之虛妄無稽。因此沉溺仙道之事，幾乎貫穿其大部分的帝王人生，至於此事背後，固然亦涉及作為帝王天子無法逃避的封禪、權力、慾望等等帝王心理及其人生焦慮的複雜糾葛，甚至衍為郊祀常典，亦隨著大批燕齊方士之言起舞，武帝竟深信「神仙祭祀致福之術」，⁴⁵同時結合當代「君權神授」的神學論述。所謂郊祀大典遂隨之異化而為方士群體主導下的仙道祈求儀典，⁴⁶從而使攸關治道與政教的國家常典，瀰漫著仙道迷狂氛圍之下的詭變憂患。更不必論及至於因仙道沉迷帝王立身行事所牽動的宮殿建築、儀典動員，物質資源種種奢華無度，誠然一一皆映現其深繫君國治道及天下安危的憂患。

藉由司馬相如〈大人賦〉的仙境書寫，不難洞燭其中深切關涉帝王之神仙夢幻及其生命焦慮的困境本質；另一方面從賦家諷諭的面向而言，既是帝王內在深切渴望的仙道夢想世界，自然是書寫策略下的不二選擇，於是〈大人賦〉裡大肆鋪陳的仙境繽紛，顯然正是帝王神仙大夢的最佳代言

⁴⁵ 參見〔漢〕班固：《漢書·揚雄傳》卷87，頁3550。

⁴⁶ 參見王青：《漢代的本土宗教與神話》（臺北：洪業文化公司，1998年），頁94-130。

者，同時對於賦家本身而言，其實一針見血地揭櫫漢代帝王仙道迷思與賦家治道諷諭之間，以夢幻為其對話核心及論述交集的重要書寫特質。

〈大人賦〉既是賦家司馬相如以文學語言侍從身分，針對漢武帝所從事貴遊諷諭的經典作品，也是映射當代帝王閃躲在帝國大業背後的生命焦慮及其人生困境，同時更是賦家藉由仙境與夢境之彼此合流，不僅映襯盛世帝王生命困境，却也相對足以洞鑿賦家遊移於文學侍從與治道諷諭間的書寫困境，⁴⁷由此觀之，〈大人賦〉不僅是漢賦首席大家司馬相如的經典之作，從賦學的學術文化意涵而言，更是一篇藉著仙境鋪陳與夢幻書寫所展開的一場攸關仙道與治道論述的君臣對話，却又深刻映現帝王與賦家之間各自不同的身分困境及其焦慮本質。

漢賦與諫書之間，往往若即若離，同時也不即不離，兩者之間既有交集，卻又儼然有所分際，因此從上述漢代司馬相如〈大人賦〉與〈諫獵疏〉的重新審視與探索，不難洞鑿其中消息，然則漢賦可說是中國文學史上最華麗的一種文體與文類，當漢代賦家曼妙運用著如詩如夢的獨特文學衣裳，曼妙舞動在宮廷廟堂之間，從而暗通款曲般傳遞著理所當然被視為「義尚光大」的君國諷諭，事實上就賦家心靈而言，又何嘗不是另類的諫臣宣示與行動實踐，於是以美麗裝扮登場的漢賦往往化身為另一種驚彩絕豔的諫書風華，漢賦也許因此可以被視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美麗而深情的另類諫書變創，即使後來漢代另一代表賦家揚雄曾有「壯夫不為」的喟嘆，但在他所謂「雕蟲小技」的感慨係之背後，其實適亦見證賦家與諫臣之間往往難以左右逢源的歷史宿命，並且從本質上而言，絕非是一種名為：美麗的錯誤，反之，藉由像司馬相如〈大人賦〉等等如是的漢賦演繹，及其與〈諫獵疏〉一類賦體奏疏的閱讀結合，更得以從中映現漢代賦家在盛世帝國之下曾經的美麗與滄桑，於是從文學史上司馬相如不一而足的辭賦經典背後，適可進一步洞鑿其中潛伏於「宣上德以盡忠孝」及「抒下情以通諷諭」之下，遊移於文學侍從與帝國諫臣間兩種不同文化身份意涵的重要心靈軌跡，也是漢代賦聖司馬相如追夢諫臣的另一種內在焦慮隱喻。

⁴⁷ 漢武帝雄才蓋世，却也沉溺仙道，成為後世諷諭沉迷仙道的重要範本，例如明初文臣之首宋濂即藉此事諷諭明太祖，並撰〈蟠桃核賦〉，其文謂：「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入無有，變化莫停……恣燕齊之方士，騁詭辯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請參見拙文：〈仙道、聖政、世變——宋濂〈蟠桃核賦〉之仙道書寫及其明初史學意涵〉，《漢學研究》第26卷第2期（2008年），頁108-109。

